

# 沙尘暴引起的联想

——音乐艺术社会功能的再反思

撰文/王西麟



Ass

如果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那春天就是北京最坏的季节了！因为每年最大的风沙多在北京的春天，常常是粉红的桃花和艳黄的迎春花盛开得正好，又有柳枝吐绿，红黄绿各种颜色把十里长街交织点缀成多姿多彩春意正浓的时候，却遭到一连几天几夜特大的风沙肆虐把它们刮得死去活来，遍地落花，残留无几，光秃秃的树枝顿然失去美丽的生气。我很少看花，但是每当这时，总会由于大自然的美丽被破坏后的惨淡而使我暗生感慨之叹。每当春天的漫漫风沙来临，常常在每个深夜听那呼啸拍窗令人心悸的阵阵狂风；早晨风停了，那紧闭的窗户内外的窗台前总有厚厚的一层黄沙。少年时代我读过茅盾的作品，其中有某篇后记的大意说：“文章写完，刮进窗来的沙土已盖满了书桌和纸张。”可见这已是久的历史现象了。

近几年北京春天的风沙越来越严重，于是出现了“沙尘暴”这个正式学名，可见不知自哪年开始，风沙的规模和为害的程度都比从前有了更加巨大的质的不同，而且严重性逐年增加，尤以今年更加可怕。连续多日，深夜呜呜巨响，每天早上醒来看窗外，都见满大街黄沙厚厚的一层，街旁停泊的排成长龙的轿车无不被黄沙封顶。黄沙之灾据说去年有二十万吨，而今年听说又有四十万吨了！这样翻了一番地增高下去，后果实在堪忧！而一直还不见防风治沙的任何方案出台。“沙尘暴”引起的环保后果还在扩大之中，不知道那已成为垃圾的数十万吨的黄沙将向何处清理？

一件事物常会有多种看法，对“沙尘暴”我只以为人们都会为之忧虑，尤其是为身临其境的沙地的民众忧虑，并从而呼唤政府的治理方案早日出台。但是人们的想法是大大不同的，我听说远在海外和香港的人士对“沙尘暴”如同南国人没见过大雪一样新鲜，有人竟因此专门乘飞机来到北京并又转而飞去敦煌，只为一睹那扑面而来的巨大飞沙的场面并引以为快！又有人说，这是某电影导演雇佣多架飞机运来的黄沙洒满北京，为其“遍地撒满黄金甲”的影片造势

云云而有了娱乐意义！把灾害用作为明星吹嘘的调侃的雅趣，这种贵族式的艺术风趣那里还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前辈文人的高尚胸襟啊！这真是“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想，还有多少人关心那些置家于沙地困境中的群体啊！

而作为作曲专业者的我，被引起的感想却又大大不同——

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音乐作品和一切艺术作品，无不以歌颂党和政府的一切任务为天命。那时我们都为日新月异的祖国面貌而欢呼鼓舞，我们曾为党和政府的每一个建设事业和政府行为写作了无数的歌曲作品：三反来了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抗美援朝来了唱“打倒美帝野心狼”、反右来了唱“社会主义好”、文革来了唱“造反有理”，而歌颂祖国的江山多娇，更是持久的主题。我也写了许多歌颂祖国建设事业的歌曲。在那热火朝天的1958年的大跃进中，身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我，被那些关于为了治理沙漠的极大危害，而对防风治沙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运动所感动，我想象着从内蒙塞北到河西走廊的那一排排的高大的防风林带是改变沙漠为绿洲的最好的远景，多么壮观啊！于是我写的《植树造林歌》就很快被选中、被发表、被演唱而又被录音推广。歌中唱道“造林人马上山岗，好像军队去打仗”。此后，我对讴歌造林绿化的兴趣久久不衰。1964年，我到山西雁北，那里气候恶劣、风沙狂暴、土地贫瘠，俗话说“每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怀着对党更大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忱写下了《喊寨大合唱》歌颂植树造林，歌唱那些因树苗被洪水一次次冲毁又一次次顽强造林并终于成功的英雄们战天斗地的感人业绩。我作品中的另一个乐章还描绘了塞北江南的美好的远景，我唱道“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江山如画，红旗如海”，那优美的旋律曾在当地流传和广为称道。而如今，四



## ociation of Ideas Brought by Sandstorm

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我歌唱的美好蓝图不但没有出现，沙漠却越加严重，而且连首都北京的沙尘暴都竟然年复一年的如此凶暴。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沙尘的肆虐，我深感我昔日热忱而忠诚的歌唱全是幻想的虚假而落空了！我写的那些“植树造林歌”呀，“我们的祖国多美好”呀等等，不但毫无作用，而且从创作到印刷和演唱的一切付出都白白浪费了！更有甚者，1960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黄河”组，为了歌颂三门峡水电站的宏伟大坝的建成，我们从河南开封到晋陕交界的禹门口沿着黄河千里之行深入生活。当时，我们以饱满的热忱、充沛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而写成了七个乐章的《新黄河大合唱》，并在回校后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了排练，演出后反响很好。这部作品，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建设三门峡大坝的工人英雄们，歌颂了在黄河三门峡截流抢险中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劳动民工们，歌颂了黄河水清的美丽远景，歌颂了伟大的毛主席并极被誉为“圣人出，黄河清”；当时担任独唱的是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教授。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歌颂的却是一个错误的工程！这个淹没了十数个县的巨大水库由于最初计划的错误而被泥沙很快填满而不得不又从大坝下面打孔挖洞排沙从而使大坝彻底报废！从1949年直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年来，我和无数的作者们写的这些歌颂每项政治运动和建设事业的歌曲，不但对历史毫无意义，而且对历史说了假话。大跃进失败了，所有大跃进的歌曲，不是统统都报废白唱了吗？反右派改正了，反右的歌曲还有意义吗？而全国同类工作所浪费的人力、物力，到底有多大，谁能计算得出啊！

我站在紧闭着的双层玻璃窗前，看着窗外天空中肆虐的飞沙走石和卷飞半空的垃圾纸袋，涌起多种复杂的心情：有对我和一代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自责和忏悔，有对被盲目的愚忠而误导的惋惜，还有被骗的愤慨，更有对后来者再勿重蹈覆辙的告诫和默默的期望。我殷切地盼望的再也不是歌颂植树造林或长江三峡大坝的音乐作品，而是何日能治理沙尘暴而使北京和全国春天的大自然的桃红、花黄、柳绿的美丽不

再被沙暴摧残！但是随即我又想起，好像五十年来还从来没有过治理沙暴的环保计划和蓝图，有吗？

五十年过去了，文革也过去了，我们的音乐和文学艺术据说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而提倡多元化了，但是我在近来的（2006/4/20）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艺报》上仍然看到“文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连篇累牍的大栏报道，要求文艺必须“永远对乡村投以深切的关注”。于是，我深深的疑问就来了：有关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根本大政的科学方案和蓝图在哪里？或者说何时出台？难道这个方案和蓝图不比诉诸文化艺术的关注更有功效吗？五十年来有没有这样的蓝图？如果有又执行得怎样？如果没有，为何不去尽快早早地制定而却拼命用文化艺术来鼓吹救命呢？我担心，即便出来了好的关注农村的音乐或文学艺术作品，而农村的面貌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如上海音乐学院在1958年创作而获成功并大量演出又出版了唱片和总谱的《幸福大合唱》，可称得上是大跃进文化的音乐代表作品了，还获过世界民主青年大会的国际奖，可如今它的意义安在哉？就像我尽管写作了《植树造林歌》、《新黄河大合唱》，而沙暴却仍然肆虐、三门峡大坝仍然报废至炸毁，而大坝炸毁后的黄河还是夹着泥沙滚滚而来一样，即文学和音乐艺术就是再关注／再关注／再关注，也完全无济于事而救不了命啊！

我提出的问题是：沙暴五十年治理不好，是因为艺术家对农村不关注或“植树造林歌”没写好吗？今天就算写出了第一部治理沙尘暴的交响乐而且极为成功，就能解决沙暴的治理吗？而音乐家和文学艺术家们自己，难道还不应该自我尊重人格而总结被沦为说谎的工具的历史教训吗？“唯乐不可为伪”啊！如果你的人格还不够强大无法同邪恶战斗或抗衡，那就保持自己最后清白的底线吧，再也不要写作说假话的作品而充当骗子了！

（王西麟：著名作曲家，北京交响乐团驻团作曲）

责任编辑 / 王秀玲